

政治知识化与 理性政治的成长

郭剑鸣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

政治知识化与 理性政治的成长

郭剑鸣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知识化与理性政治的成长 / 郭剑鸣 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73-2577-5

I. 政… II. 郭…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115 号

政治知识化与理性政治的成长

著 者/郭剑鸣
责任编辑/于俊道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新星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新星印务有限公司

880×1230mm 1/32 10 印张 25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577-5 定价: 3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政治知识化是一个思考理性政治生活建设的课题，也是知识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变迁与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密不可分，新政治形态的成长需要有新知识形态为支撑，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道理建构是政治制度建构的上位问题。从古典政治学创立时起，政治知识化就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哲学王”思想的提出就是其中的重要结晶。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政治学，但一直重视寻求理性政治生活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最终浓缩为“修齐治平”思想，强调人格和知识训练是获得理政资格的前提。在西方近现代社会，为使政治生活摆脱宗教迷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霸权，有众多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过政治与知识、政治与学术和理性政治的问题，其中的杰出代表有培根、孔德、韦伯、哈贝马斯和欧克肖特等。我国清末国学大师梁启超也专门谈论过学术竞争力与中西方社会竞争力的问题。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徐复观也作过《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文集，对学术、知识与政治的界分和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研究政治知识化问题，不仅可以使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拓展政治学的新领域，比如说知识政治学；更可以增加各政治生活的主体明白政治逻辑和道理的机会，以提升全社会的政治创新力、政治规范力、政治执行力和政治参与力，使理性政治生活的成长获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共同支撑。学术界对政治知识化问



题的研究尚处于理念唤醒、概念建构阶段，还缺乏深度的学理建构、践行机制和社会条件方面的研究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执政的命题，为政治知识化和政治理性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

政治知识化、理性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的科学化今天还没有成为事实，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发展趋势。”“知识改变命运”的警句，人们可以脱口而出，“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也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的论断在经济学领域已形成共识，知识经济已衍生为一种新经济方式。然而，“政治知识化改变政治命运”的道理，人们却很少去体悟或体悟不深。其中的原因很多，重要一条就是人们认识政治问题的方法和维度大都还囿于传统，断章取义地解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意义，片面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一条路，故而多数后发型国家都选择经济——技术主义发展战略，不重视知识变革对解决政治问题的意义。马克斯·韦伯曾批评说，那种从经济权力析出政治权力的办法过于夸张，进而混淆了“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因素。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断言对政治、权力的解释只有经济和财富一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可以从一个时代或文化与另一个时代或文化的对比中发现。真理是与人们隶属的时代和文化所特有的世界观有关的。”人们用知识解释政治的范式可以作为在时代及文化变迁条件下补充经济解释政治的一种范式。

在思想史上，古代西方思想家从思考政治生活伊始，就把政治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认为政治是一种知识，政治学是最高的学术形式。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如“七贤”（学派）、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思想家兼执政官索伦、伯里克利、毕大各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正义、美德、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其中，柏拉图概括的“哲学王”思想是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最经典表述。他洞穿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核心在于理性，“理性所具有的知识，

是它统治自我其余部分的资格所在，这知识，连同因这知识而有理的统治，构成王者之学。”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政治的知识化拔高到一切学术之巅，认为政治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他说，正如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的一样，各种学术和科学也可以理解为最终服从于一门居主导地位的科学，它包含广义的人类利益。而这门主导科学显然是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它“决定诸如城邦需要哪种科学，哪一种人应掌握哪门科学以及掌握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才能，诸如将帅之才、持家之能、修辞之技，都服从于政治知识。”在古代中国，虽然孔孟提出将掌握知识，甚至掌握不同性质的知识作为区分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论述，有价值趋向上的局限性，但其中已包涵以知识作为权力配置基础的思想。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辟用知识变迁来解释政治变迁的思路也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早在清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根源。他们认为“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国学大师梁启超更是直言“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理路，后来成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只是“五四”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权完全被经济之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树起了“创新知识—解构传统—建构多元”的理论范式。尽管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元叙事”方式的冲击。可见，政治知识化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政治与知识关系的逻辑是政治—知识—政治理性—政治科学—科学政治。在知识社会和后革命社会的今天，政治生活告别经验的主导，走政治知识化之路，推动执政方式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型，理应成为我国科



学政治生活成长的选择。

从知识的视角来思考政治是知识政治学的基本路径，也是知识政治学学术资源的源泉。知识政治学强调，政治变迁不过是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这样的观点也许有武断之嫌，但它提升了知识的递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知识政治学的核心观点是：新政治形态需要有新知识形态为支撑，对政治建设和发展而言，政治制度的建构远不如政治道理的说明那么重要，颇有见地。知识能否解释政治？关键在于知识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通约性，关键在于政治能否知识化？对此，欧克肖特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他说：“一个根本不能用理性来解决的政治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一定是伪造的”。理性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完整的知识政治学方法应该是用知识解释政治和将政治本体建构成知识的统一。但是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一致关系并非没有曲折，没有障碍。其中最容易引致政治非理性的因素就是政治系统内外的权力斗争。马克斯·舍勒把它称之为知识社会学最困惑的领域。确保知识发展与政治发展趋向一致的关键在于建立对权威的理性约束机制。政治知识化的目的不是消解政治的权威，独树知识的权威，而是将政治权威纳入知识所建构的理性逻辑的轨道，使政治生活中权威的运作按照政治科学内在规律和可以预见的结果方向演绎。

沿着知识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可以发现西方古典政治文明是政治知识化的典范，它把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政治道理的说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用知识解释政治和政治本体的知识化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西方古典政治文明的这一传统对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发育、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政治与知识的关系也很紧密，不过不是政治知识化，而是知识政治化，政治神秘化。中国传统政治树立了知识权力化的思想——“学而优则仕”，建构了知识权力化的制度——科举制。在那里，知识相对于政治而言，只具有工具意义、解释的功能，其创新政治、批判政治和规范政治的功能大受限制。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始终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中国

近现代政治的成长是伴随着新知识的引入而生的。中国近代政治主要以西学为知识基础，但对生长于本土的中学知识却采取了不理性的态度。中国现代政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本土知识的结合为支撑，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包容性不够。因而，我国近现代政治建设的知识基础都存在一定意义的缺损。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对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出现误区，政治生活时而理想化，时而神秘化、经验化和泛化的一大引因。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即明确提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举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补课浪潮，政治知识化也获得了难得的机遇。本书仅仅是抛砖引玉的尝试，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和回应。

绪论 政治知识化与理性政治 的逻辑关系

政治知识化探讨的是一个政治理性和确定性的问题。众所周知，英国思想家欧克肖特曾以批判的态度反思过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霸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过欧氏只是对西方近现代政治简单地以理性替代传统和经验的做法进行拨正，虽然他没有说这是正题反做，但他严厉痛斥过“将政治理解为纯经验的活动是不合适的”。^①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社会境遇下应该思考的问题恰好是欧氏提出的反题，即“经验主义霸权”。西方可以矫“理性霸权”之枉，国人则必须在经验化、臆断化、神秘化仍然浓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认真去深思政治理性和政治确定性的建设问题—探索政治规律、规范政治过程、培育政治素养、提升政治技能。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执政命题，体现了党对政治生活理性化认识的飞跃。

一、政治知识化与政治理性化

人们对“政治知识化”的提法恐怕会感到陌生，但“政治合法性”一词却早已成为学术舞台上脱口而出的话语。其实，政治知识

^①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化和政治合法性是一对关系紧密的概念。政治知识化是获取稳固的政治合法性的前提条件，而政治合法性反过来又能沉淀更深度的政治知识化。那么，什么是政治知识化呢？还是让我们先从广为人知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谈起。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治的合法性研究中，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它的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为此，确定一个政体究竟适合哪一邦，适合哪些人民，就必须遵循“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① 其意已道破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天机就在于多数“认同”。后人于此虽有新解，但其内核未出其右。例如，近代研究合法性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契约论，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锁定为“公意”。现代对政治合法性作出系统解释的马克斯·韦伯概括出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三种人们所熟知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类型的合法性所依赖的认同基点。所以，尽管人们对合法性问题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歧义，但在“政治权力必须得到公民的普遍认可”这一点上是基本不争的。^② 那么，由此上溯，民众凭什么会认同政治权力？在什么标准平台上认同政治权力？便不难发现合法性认同的上游问题，即：认同资源。我们可以把这种资源分为两种类型：事实性认同资源和规范性认同资源。任何可持续的合法性认同都应是两种资源的有机统一。前者即人们通常讲的政治运作的民主性、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后者即人们对政治本体及其运行规则的把握，也就是政治知识体系。政治知识化便是建构并获取这种规范性政治认同资源的基石。

知识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基于对事物客观性的把握而积淀为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0页。

② 孙关宏等主编：《政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常”，成为“可以交流和传递”的东西。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孟子曰：“则见而知之。则闻而知之。”（《孟子》）荀子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朱子曰：“知，谓说其事之所当然。”（《四书章句集注》）《说文解字》中也说：知者，词也。识者，常也。所有这些经典的解释均认为知识是对事物规律性的稳定认识，并非可以随意解释的臆断物。知识化就是在对事物本体的把握中去神秘化、去臆断化，向常态化、规范化，形成对事物“则见而知之。则闻而知之”的过程。

政治知识化目前尚属待开发的“处女”词。有学者认为政治知识化“意味着政治的生成与运作必须借助知识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与确证，”^① 着眼于探究政治如何获取知识资源的支持而巩固其合法性。视角新颖。不过，如果从认识论意义进一步上升到本体论意义，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知识化不仅包括借知识识政治的一面，更含有将政治本体建构成知识、转化为知识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政治知识化是把政治本体建构成“见而知之”、“闻而知之”的寻常现象和借助其他知识来把握这一寻常现象的统一。成功的政治知识化需要有漫长的积累，一般包括政治理念提炼（哲学化）、政治制度与方法验证（科学化）和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播（社会化）等环节。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得以获得认识政治的共同平台，使政治告别神秘化、臆断化、贵族化和经验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平民化，而成为大众可知、可与、可议之物。

早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表现出的所谓的“示范性”，无不是扎根于其不间断的政治知识化基础上的。从古希腊政治文明到现代民主政治，都是在对政治本体的勘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政治目的、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政治发展等政治基本问题的

^① 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探索精神近乎一脉相承，表现出哲学化、科学化和平民化的总体特征，积累了成熟而系统的政治知识，形成了庞大而执著的政治知识阶层，为民众认识政治、参与政治提供了平台。

政治哲学化。重视挖掘政治目的、政治价值，把政治建基于理性的考量上。在古希腊、罗马人涉足政治问题伊始，就不断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关于政治本体的命题。柏拉图以其著名的“哲学王”思想将政治、知识、理性和德性融为一体。亚里士多德则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出发，开启了人们对政治生活在人生中的意义和责任的思考。他们对政体类型的探索以及一致将德性视为甄别政体好坏的主导标准，不仅进一步肯定了政治与“完成某些善业”的关联，而且为后人的政体研究与建设初定了框架。西塞罗率先对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国家的目的和性质进行了界定，他说：“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① 斯多葛学派提出自然法是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命题，开创了用正当性和正义的眼光来打量政治的先河。近现代以来，有关政治本体的哲学思考更是接踵而生。诸如：国家主权、法的精神、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正义论、意识形态论、民主与自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产权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守夜人”、福利国家、反国家等等，几乎涉及到政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方法上也体现出高度的哲学理性。一条由道德理性主义向自然理性主义、逻辑理性主义、历史理性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和现实理性主义演展而来的脉络跃然于人们的眼前。政治哲学化是政治知识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从不同视角对一个个政治基本问题的思辩，政治才像“金鱼缸”一样被人们看得透彻，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才得以深刻而稳定。

^①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政治科学化。注重对政治问题的科学分析，并在实践中验证政治理想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如果说对政治的思辩和推演还多是建立在假设意义上的话，那么政治科学化就是将政治建基于现实的可行性途径。西方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做法也滥觞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学问也因此而成为西方最古老、最受重视的几门社会科学之一。他说：“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① 为了寻找实现这一“至善”的最佳政体，在他的带领下，吕克昂学园对希腊半岛 158 个形形色色的城邦政制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政治研究最经典的成果《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这种以实证归纳代替假设推理来对待政治现象的方法在 20 世纪中叶发展到了巅峰。虽然，行为主义的“实验”、“技术”、“量化”和“纯科学”等信条被后人视为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他们所倡导的冷静和科学态度，无疑增添了西方人对政治的非人格化理解。将政治理想直接付诸于政治实践中反复检验，是西方对政治问题形成科学认识的又一法宝。例如，在对民主政治模式的认识和选择中，英、美、法、德等主要的早发型国家就没有囿于理想的设计，而是设身处地以本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变量，分别尝试了渐进——妥协模式、激进——革命模式和改良——保守模式，使民主制度得以在各自的国家扎根下来。在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上，先后经历了一元国家——有限国家的数次反复，才最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共存的格局。^② 在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机制中，也是有了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及反国家的实践比较，才厘清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各自的优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48 页。

②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 年，第 136 页。



劣。政治科学化是政治知识化的保障。正是有了对待政治问题的科学态度和路径，人们才可能认清政治现象的真面目，并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

政治平民化。注重将政治推向民众，让民众在频繁的政治活动中品味政治的魅力，增长政治技能。政治平民化包括政治机构向民众灌输政治信念、传授政治技能的“化人”过程和民众主动参与政治活动、接受政治洗礼的“人化”过程。早发型国家在这两方面都具有充足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从思想资源看，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动物”的命题、马基亚维里的“世俗政治说”、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无疑是其中推动西方政治平民化的理论基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整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建立之后，大学开始成批地招收政治类学生，政治学一度被喻为“公民学”。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政治平民化的思想策源地和实际推动者。从制度安排看，早在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时期就开创了广场民主的政治模式。那种用“贝壳流放”的方式监督执政官、用“抓阄”的方式确定陪审员的做法，虽然不近情理，但它让民众感受到了最初的政治快感和亲切。其中所折射出的政治开放性、民主性和透明性构成了西方政治平民化的传统制度资源。在君主和贵族垄断政治资源的时代，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英法等国的等级会议制对平民问政来说虽显得匮乏而单薄，但它们已向人们展示出宪政议会制的制度雏形。近现代以来，民主政治的三大制度支柱，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为早发型国家的政治平民化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尤其是深度的竞选动员、自由旁听议会会议、政策辩论转播、重大决策事前听政、频繁的民意调查、广泛的政治结社、社会组织的网络化以及形形色色的街头政治活动等，为想要参与政治活动、了解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的民众准备了尽可能的制度支持和机会。政治平民化是政治知识化的根本和归宿。正是由于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政治，在早发型国家，政治话题才脱去了神秘的外套，“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正是通过两千多年来深度政治知识化的努力，西方社会才留下了一部部传世不衰的政治名著、诞生出一批批睿智执著的政治思想家、提出过一个个深入浅出的政治命题。这也大大拓展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规范性资源，使早发型国家政治的发展不至于出现大的起伏，科学权威对政治运作的规范力、监督力才得以稳步增强，从而防范政治生活走向极端。

当然，早发型国家政治知识化最重要的经验并不在于其形成的政治结论、建立的政治制度，更不意味着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方式具有普适性，事实上，他们关于政治本体和展开方式的认识的许多结论还存在明显的偏见和空想，甚至固执。其经验在于他们探索政治科学内在规律的执着精神、应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态度和化解政治纷争的多元路径。他们在政治知识化的过程中确实摸索出一条认知政治的理性路径，那就是政治哲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形成了思考政治生活的冷峻态度；树立了使政治告别神秘化、臆断化和经验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理念；揭示出一系列迈向科学政治生活的学理逻辑，那就是在政治发展中，“对政治道理的说明”是政治模式选择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政治变迁实际上是知识的变迁”^①，可行的政治转型（不论是制度意义的，还是执政方式意义的）需要在对新政治模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基础上才能开启，走“先知识积累——后模式建构”之路。因此，批判地吸收早发型国家政治知识化的经验不是要简单模仿其制度、接受其政治结论，而是要学习其将政治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探索政治规律的不懈精神和建构系统的政治知识体系的科学方法，以提升我党的政治探索力、政治认知力和政治创新力。这才是我们倡导政治知识化的出发点。

^① 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二、科学执政是理性政治的践行方式

科学执政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既指明了科学执政的必要性，也阐明了科学执政的精髓。其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在执政过程中要“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强调“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执政。

目前，对科学执政这一新命题，学术界的认识和研究还刚开始，尚处于由理念、观点、见解向理论化、模式化提升的阶段，特别是其学术渊源主要是社会各界对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应该说现有的认识并不深入，尚有两个方面的欠缺，其一，没有强调科学执政应遵循政治科学内在规律；其二，思考科学执政的出发点主要集中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经济及社会层面，缺乏从政治科学学理上对这一命题进行建构，有将科学执政问题功利化之嫌。至于学界之外的认识可能更为肤浅。欧克肖特之所以极力吁促理性地思考政治生活，正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世界可能是最经不起理性主义的检验的——政治总是深深布满了传统、偶然和短暂的东西。”^①在我国现行的政治文化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将政治生活领导化、主观化和神秘化的倾向，既限制了民众的政治认知力、参与力和监督力，又容易造成某些行政主体将政治泛化，使政治成为无边无际的领域，成为随意利用的“尚方宝剑”。这些无疑都是科学执政的现实障碍。其中的原因复杂而悠远，但从学理上讲，根

^①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页。

本一条就是政治知识化进程相对滞后。

全面把握科学执政的内涵，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科学执政是我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一个关系到能否有效提高我党执政能力，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严肃话题。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作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科学执政既是 58 年来党执政治国的基本经验，也是在新形势下确立的执掌政权的重要价值取向。坚持科学执政，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充分尊重，表明党在执政理念上实现了新的飞跃。

2. 坚持科学执政必须探索并遵循三大规律。坚持科学执政，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最重要最根本的执政规律。科学执政，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从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研究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研究以人为本的社会运行规律，构建和谐相处的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通过对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使思路和行动更符合客观实际，更能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意愿。科学执政还要在这三大规律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政治科学的内在规律，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政府、公务员与民众这些基本的政治关系，使党的执政活动符合更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3. 科学执政是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坚持科学的思想就是要坚持科学的